



# 沉船橡胶田苏联房，海南文物普查太“全面”了

# 读取历史和现实，重建现代家风

□ 余世存

现代人的家风家教跟传统家风家教有了很大的不同，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无论是社会经济的运行模式，还是家庭结构模式，现代都大大不同于古代。传统的大家庭，多有三世、四世同堂的现象；现代家庭，多是两代三口之家。

对于一般家庭来说，人们的日常行为模式也发生了时代的变化。“家长制模式”基本成为过去，“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的原则被淡忘，父亲或母亲等家长在家里说一不二的权威被消解……按照一些人的观察，不仅我们的家庭迅速发展到了孩子为中心，就是世界范围内的家庭，也在经历“逐子女而居”的过程。

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人和家庭意识到家风家教的重要性。“卷”和焦虑是人们都注意到的现象，解决方法之一就是家庭要承担起应有责任。我在《中国人的家风》中说，家在人们心中是光明温暖的象征，在总结古今中外的家风家教的基础上，我们需要重建家庭成员关系，重建家庭伦理责任。

## 传统家风仍值得现代人传承

传统中国人的家风有见贤思齐的现象，一旦某家总结出好的家风，便会迅速传遍大江南北，如《颜氏家训》《温公家范》《朱子家训》等。我注意到，《朱子治家格言》问世之后，其中的不少家训成为很多人家的家风。前不久，一个张姓人家子弟还感慨地跟我说，他小时候见外公给他们写春联、寄语，经常写“黎明即起，洒扫庭除”，我说这就是《朱子治家格言》里的话，成为千家万户代代相传的行为模式。

传统中国的家风家训中，有大量让现代人敬服羡慕的地方，如不少人对曾国藩家的“书蔬鱼猪早扫考宝”的八字家风很有印象。但在现代人的日常行为模式里，大概只有读书一项还和曾家家风沾边，其他多付之阙如。早起的不多(早)，自己扫地的不多(扫)，跟先人对话的不多(考)，跟邻居经常走动的不多(宝)。

传统中国的孝道是全民遵循的人伦大道，但现代人很少有人知道，一味顺从父母，甚至父母有错也不劝谏父母，陷父母于不义，是不孝；或者，自己在外阿谀讨好，或作威作福，从而陷父母于不义，也是不孝；家境贫寒以至于父母到老了，子女不能改善生活以供养父母，同样是不孝。这些不孝的原则放到今天，估计会有不少人汗颜。

因此，传统家风仍值得现代人传承，不能因为其属于历史而将其弃置一边，不能因为生产生活方式的古今之变，就想当然地以为传统家风不适用于今天。孔子所在的春秋时代的贵族家风、汉唐时代的士族家风、宋代的士大夫家风、明清的平民家风，都有可圈可点之处，都是我们建设家风的来源与基础。比如，从汉代到明清，中国人多知道的“遗子黄金满囊，不如一经”等，在今天更有现实意义。

## 现代家庭的平等原则：对待家人要像对待朋友一样

传统中国的家风家教中，多有要子孙立志的训示。这在今天同样有现实意义。“赐子千金不如教子一艺，教子一艺不如赐子一名。”自给子女取名开始，我们就给孩子寄予了美好的希望，也是要孩子明白，立身处世应该有所作为有所处。青少年时期的立志非常重要，父母通过取名引导让他早早立下志愿，这样他就能有所为有所不为，在人生的展开中有所安顿。

今天的青少年习惯了对于物质生活的享有，对信息世界的消费，习惯了按流行的模式如升学、毕业、工作等模式生活，有时反而缺失了自己主动的人生志向。因此，一旦在学习、工作中不如意，就容易归咎于父母和“原生家庭”的责任。

今天的种种现实，既可以从时代发展中找原因，也可以从家庭运行模式中找原因。人们习惯把家当作一个睡觉休息的空间、一个两代人之间或夫妻之间的活动场所，却忽略了一个问题——这样的空间需要共建，需要治理。宋代大儒朱熹说过，每个人都应该在家庭中扮演好自己的角色(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和、妇柔)。可见，传统的修身齐家到了朱熹的时代，已经有了人格独立和角色身份配合的要求。

当然，现代家庭跟传统家庭确实有所不同。我在《中国人的家风》中，总结了从历史到现实的经验，提出一个现代家庭的平等原则：对待家人要像对待朋友一样。因为只有像对朋友一样对待父母、伴侣和子女，我们才有彼此的尊重之心、平等之义，以及边界感。

这种平等精神虽然在现代家庭是一个普遍现象，但还没有落实到日常生活中来，家人之间还缺乏应有的尊重和边界感。查家人日记、手机、朋友圈的现象，把伴侣和孩子视为自己私产的现象，仍较为普遍。

## 现代家风是家庭成员一起成就的

“安顿”是这些年流行的热词，我也写过《安顿之书》，从家风、节气节日时间、经典等多方面，尝试给人们提供安身立命的参照。在我看来，现代家庭的家风不是自上而下给予的，不是父母或先人设定的，而是家庭成员一起参与成就的。

比如，孩子的学习教育，如果父母不珍惜这个机会，参与到共读、共学中来，家庭中的代际联系就缺乏基础。一旦孩子毕业或到异地工作生活，孩子与父母的联系就徒有其表，甚至连徒具形式的形式都会丧失。

有一个三口之家，孩子目睹父母工作持家的艰难，希望一家人开开心心，就以“不敬巨头”要求父母和自己。从此以后，她把学习中不愉快的事情、父母把工作中不愉快的事情，都放到屋外，只要在家庭，三口之家就是开心的。父母感念地对采访者说，他们的家风就是“不敬巨头”。

子女参与家风的形成，在今天不是孤例。子女和父母在通读古今中外的历史中，找到那些家庭生活的正大有益的原则，非常普遍。如读书、学习乃至使用人工智能等工具，每个人都对家庭有建设之功；不少家庭的餐桌饭菜经简单，只具自家乡土风味，但子女的参与，让各地美食都出现在自家的餐桌上。

从历史和现实的经验中，我对现代家风的建设充满信心。在科技文明把人拉入智能化的时代，在个人的身份多元丰富的时代，现实中的“修身齐家”更有现实意义。元宇宙、二次元、数字原住民、AI等，已经成为现代人的生活方式，其中出现的种种问题，或许可以从人的修齐之道来着手解决。我相信，“回家！爱你的家人！”会成为文明社会的共识。

《中国人的家风》书封。 海南出版社供图 (作者系化学学者)

苏联植物专家指导。为了给苏联专家提供良好的生活环境，农场修建了一栋欧洲风格的砖木结构山脊型瓦房供其居住，因而被称为“苏联房”。

唐凯说，2020年在央视一套播出的讲述海南农垦三代建设者橡胶情缘的电视剧《天涯热土》，就是以红华农场红专四队(包括苏联房)为主要基地。记者在现场看到，这是一幢独立的房屋，每边各6个十平方米的房间，目前建筑保存完好。

东红农场苏联房也建造于类似的历史时期。琼海市“四普”工作队队长何声乐介绍，这8栋具有历史意义的建筑始建于1952年，建筑由苏方专家设计指导，具有明显的苏式风格，施工单位、人员和建材均来自中方。

## 追寻“苏坡爱豆”在海南的足迹

有一位历史文化名人，不生于也不葬于海南，仅仅在海南待了3年，却留下了深刻的印迹，甚至改变了这里的文化生态，他就是今天仍被年轻人奉为“精神偶像”的苏轼。即便被贬海南、生活艰难，苏轼也乐观地发明了玉糝羹、天门冬酒等众多美食。海南省博物馆文创区满柜台的“苏坡爱豆”(谐音Super idol，超级偶像——记者注)椰雕系列冰箱贴中，就有一款“美食博士”。

在澄迈、儋州、海口、临高、昌江等地，东坡遗风无处不在，尤其是儋州，他住了3年。

位于儋州市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东坡书院，原名载酒堂，始建于北宋元符元年，即苏轼抵达儋州的第二年(1098年)。当年，苏轼带头凑钱建造此堂，并引用《汉书·扬雄传》中“载酒问字”的典故为其命名；初为茅屋，明永乐七年(1409年)，人们将茅屋改建成瓦屋，明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更名为如今的“东坡书院”。

儋州市“四普”工作队队员吴淑全说：“东坡书院是人们为了缅怀和纪念苏东坡的文化胜地，也是传播中原文化之所，对海南的文化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距离东坡书院不到10分钟车程，有一处考古遗址也与苏轼密切相关——桃榔庵。北宋绍圣四年(1097年)，苏轼父子初到儋州时，居住在官府驿站，后被上司逐出，在城南一片桃榔林中搭建茅屋，将其命名为“桃榔庵”。

在苏轼北归后3年，海南出了第一个举人，又4年，出了第一个进士。桃榔庵在清朝成为书院，又在清末废科举之后成为一所学校，1920年遭火焚毁，今已不见任何地面建筑。

吴淑全介绍，桃榔庵在2022年、2023年完成两期考古发掘工作，于2024年整修开放。记者看到，尽管这里已不再是学校，但和东坡书院一样，仍有青少年研学团队不断到访。东坡先生的教诲，孩子们今天依然愿意听。



王震将军橡胶试验田。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蒋肖斌/摄



红华农场苏联房。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蒋肖斌/摄



三沙文物普查工作队队员乘坐小艇登上岛礁。 受访者供图

提供了一组数据：调查历时30天，航程约600海里，调查西沙岛礁17处；复查和发现不可移动文物75处，其中复查“三普”文物点48处，新发现、登记不可移动文物点27处；文物年代由唐宋到当代，其中发现不可移动文物最多的甘泉岛有55处。

“我们的普查队员大部分是今年3月刚入职的年轻人，这是他们参加工作后面临的第一个挑战。从文昌的清澜港出发，要坐20个小时船先到北礁，再坐六七个小时才能到甘泉岛。”寿佳琦说，“队员晕船、晒伤，都是常事。20多天里，吃住都在船上，只要天气好，我们就争分夺秒地开展文物普查。”

在琼海的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记者看到南海西北陆坡一号、二号两处沉船遗址的400余件出水文物，那是两艘明代沉船，分别沉没于去程和返程。原南海西北陆坡一号、二号沉船考古调查副领队张凝璇是名90后，回忆起那段经历，他依然感到震撼。此次配合“四普”，他所在团队负责对海南岛近海的不可移动文物点做复查。

“有一些遗址点是在水下，我们就要到水下进行确认，深度从5米至20米不等。”张凝璇说，潜水在此时不是运动，属于工作方式，甚至还有一些风

## 为什么这片橡胶田也是文物

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目前还有690多株橡胶树。

橡胶田也是文物？那是一段近70年前的往事：1956年5月1日，以建设大型橡胶生产基地为主的海南省国营金江农场在保亭响水镇创建；建场之初，时任农垦部部长的王震将军来到农场，以普通士兵的身份参加了农垦的开荒定植与其他建设；1959年，王震在当地选择了一块40亩的土地作为自己的橡胶试验田，并亲手栽下第一株胶苗。

“橡胶试验田自1966年开割后，一直保持生产状态，直至2012年公布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后，才停止割胶。”符仙瑾说，“包括这片橡胶林在内的农场，打破了当时‘北纬17度以北不能大面积种植橡胶’的禁区。这些树依然活着，是真正的‘活态文物’，见证着并不消逝的历史。”

橡胶田是文物，超出了大众的一般认知，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在本次走访中，还看到两处新发现的文物点，是大众也较为陌生的“苏联房”——临高县红华农场苏联房和琼海市东红农场苏联房。

什么是“苏联房”？临高县“四普”专家组成员唐凯介绍，20世纪50年代，红华农场在种植橡胶初期，没有经验，屡遭挫折，国家请来

# 与风沙赛跑，抢救千年土遗址



2025年3月，崔凯团队成员在陕西定边砖井堡调查风害对修复效果的影响。 受访者供图

失殆尽。我国从20世纪90年代起重视对土遗址等不可移动文物的保护。针对土遗址表层风化的问题，业内先后提出喷渗、滴渗两种手段。使用喷壶向风化层表面喷洒水浆，但加固深度不足5厘米，表层与遗址本体不兼容，形成“两张皮”，再次脱落；使用软管深入遗址内部滴加加固浆液，但效率低，渗透半径不均匀，加固过程长达48小时。旧有的手段远远达不到加固要求。

在前人的基础上，崔凯团队首创提出了电渗注浆加固技术方法，基本原理是用电力带动加固液在土体内渗透，将电极和注浆管平行布置在遗址表面病害发育区，像医生控制输液速

度一样，精准调节药液渗透的深度和范围，将注浆时间缩短为8小时，之后使用冲击回压装置对电渗后的遗址进行加固。

团队的研究成果，需要走出实验室到自然环境现场，经过现实的检验观察，才能最终证明其有效性。于是，崔凯团队一开始在人们居住的土墙上做实验，后来与急需防风化的地方文物局联系，申报项目并进入国家文物局审批，进行小体量示范。例如，团队获得陕西文物局的批准，在干旱区域的榆林地区、湿润区域的陕南地区的明长城遗址，进行每一平方米的加固示范。

团队还先后奔赴宁夏银川磨石口长城，四川的三星堆古城遗址西侧城

墙，浙江的良渚遗址，甘肃的大地湾遗址、嘉峪关长城、乌鞘岭长城等地进行加固示范。一平方米的示范只是团队成功的一小步，未来需要确保加固材料耐久性、工艺兼容性及遗址本体安全性等均达标后，方可进入国家文物主管部门的技术推广目录。

## 奔赴历史的现场

到现场去，是土遗址保护领域最基本的要求。

20多年来，崔凯从地质工程专业的学生到土木学院教授，从跟随前辈到带领自己的学生团队，在内蒙古、陕西、宁夏、新疆、西藏等地的百余处遗址现场留下了足迹。

在遗址现场进行技术示范之前，团队需要多次前往遗址现场勘查、取样。目前可使用三维扫描技术，再现土遗址表面的起伏程度；通过轻载的解剖面进行少量取样，测试物质组成和盐分含量。崔凯表示，团队严格遵守文物法，在可行范围内寻找机会到土遗址现场。

他坦言，有些学生一开始比较抵抗到土遗址现场的工作，“有些土木专业的学生认为他们是建造大楼和大桥的人”。崔凯对此也表示理解，因为自己也曾经认为土遗址没有意义，“修建破土堆，我才不去”。

后来，崔凯在老师的引领下，才慢慢对文物保护萌生出了使命感，“我在文物里发现了趣味，还想知道为什么祖先能建造得这么结实，这么长久”。他举例，西汉时期至今2000多年，汉长城在敦煌沙漠戈壁的恶劣环境下，依然屹立在那里。“从工料建筑材料角度看，耐久性非常好。我们祖先的建筑思想中蕴含的科学价值，还没有得到充分挖掘。”

一张饼、一袋榨菜、一个水壶，这是崔凯从前跟随老师在野外勘查时带的口粮，“现在年轻人可以吃火腿肠、喝矿泉水，条件比我们好一

点”。有的土遗址距离固定居民点虽然不远，但上山下沟，来回需要一天时间。为了充分利用时间，团队会露宿，昼夜不停地观测数据。

硕士生代佳骏从本科期间开始跟随崔凯团队，去过陕西定边县砖井堡、陕西吴起长城镇秦长城城墙遗址段落、宁夏银川磨石口长城等遗址现场。站在吴起长城镇的长城遗址面前，他感到身处文化历史的长河之中，走兵运粮仿佛就在眼前发生，“中华血脉不断被唤醒，这可能就是我们保护土遗址的意义，把它们保留下来，让人们可以切身感受到华夏历史的魅力”。

## 文物保护迎来最好的时代

20多年来，崔凯感受到人们对文化遗产的向往和保护意识在逐渐提高。“以前我们去山西一些地方，老百姓把长城上的砖搬回家盖猪圈和房子。现在全民保护意识提升了，不会随意破坏文物”。

近些年，承载着深厚历史文化的文物也愈发吸引游客的目光。崔凯认为，大众对土遗址等文物的向往和重视，使他们所从事的保护工作发挥出更大价值。但他也表示，一些中小型的文物点没有设立相应的运营管理机制，对文物仍存在一定的负面影响，“年轻人保护文化遗产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有很多事情要去做”。

文化遗产保护是一个融合多学科的综合领域，崔凯团队有敦煌研究院、兰州大学、西北工业大学和河南大学的指导老师，还有经管、文化遗产和生物学等其他专业的学生。

崔凯特别想说，文科在文物保护中能发挥很大作用，包括阐释文化遗产的价值，展示历史的变迁，“例如历史上王朝衰败的原因是什么？衰败后这些遗产经历了怎样的变化？这是我们在工科领域不清楚的问题”；文科可以从文献中明确其初始建造方法，详细还原文物的建造过程，将其转化为文化遗产保护的“最小干预”原则。

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戴纳 记者 蒋肖斌

风有形状。在西北荒原上，土遗址受狂风、沙尘暴无数次撞击，风沙合谋把它们悄然蚕食出底部空腔，最后失去支撑，便轰然倾塌成历史的残章；在东部海隅，咸涩的海风在夯土表面覆盖一层结晶，日日剥蚀着土体的筋骨，致其一寸寸坍塌。

我国土遗址数量巨大。据兰州理工大学土木工程学院教授崔凯指导的团队统计，2019年国家文物局公布的第八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167处古遗址中有160处为土质遗址；762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超过190处为土遗址。该团队介绍，这只是统计为国保单位的土遗址数量，实际的数字远不止于此；同时，土遗址正以一定速度消失。

在崔凯指导下，团队依托兰州理工大学红柳创客梦工厂的培育平台，组建了跨学科创新创业项目。团队的“土遗址典型病害科学防治”技术项目，针对土遗址表层风化病害二元特殊装置，研发干涉加固方法与配套装置。近日，该项目与来自全国101所高校的118个创新项目，一起亮相中国国家博物馆“青春之歌——全国大学生创新成果展”。

## 找准病因才能对症下药

在接受中青报·中青网记者专访时，崔凯介绍，风只是摧残土遗址的外力之一，由于建造工艺的局限及长期受到自然和人为破坏的影响，现有的土遗址面临片状剥离、裂隙、坍塌、掏蚀等危及稳定性的病害。其中，片状剥离分布面积可达土遗址表面积80%以上，破坏时整块脱落，裸露的新鲜土体又逐渐形成新的风化层，如此循环，直至消